

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 二十卷一期

2020年6月，91~115



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 可能性與實踐方向

郭家華

摘 要

臺灣教科書開放政策之後，衍生出教科書價格與品質等相關問題。本研究藉批判教育學的觀點，重新思考教科書編輯的過程。首先，先說明「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意涵，藉以論述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再以批判教育學的觀點說明教科書編製過程的知識與權力運作；最後提出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之實踐方向如下：一、看見「看不見」的連結點；二、承擔社會責任；三、發展真正的一網「多本」；四、鼓勵出版社編輯者在職進修與能力提升。

關鍵詞：教科書、教科書編輯者、轉化型知識份子

- 本文作者：郭家華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博士生。
- 投稿日期：108年11月17日，修改日期：109年3月31日，接受刊登日期：109年6月29日
- DOI：10.3966/168020042020062001003

*Textbook Editors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Possibilities and Practices*

Jia-Hua Guo

PhD Student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Following Taiwan's open textbook policy, issues related to the price and quality of textbooks have been raised.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process of textbook edi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pedagogy. First, the meaning of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is interpreted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of textbook editors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Next, the knowledge and power operations of the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cess are describ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pedagogy. Finally, the following practical directions for textbook editors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are proposed: 1. Discover the implied meanings behind phenomena; 2. Tak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Develop authentic implementations of "one-guideline-multiple-versions"; 4. Encourage publishing editors to complete in-service training and ability enhancement programs.

Keywords: textbook, textbook editor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壹、前言

1981年以前，教科書是國定制，但隨著政治民主化與教育自由化，在1991年後，臺灣的教科書在立法委員和民間業者的推動下，教育部逐步開放教科書審定，1996年國小教科書全面開放，2002年再開放國中教科書。教科書開放民間出版社編輯後，知識與權力之間的運作，使教科書不僅是文化物，更是經濟商品，教科書制度所傳達的，不僅是一種文化的政策，更是政治的、經濟的政策（歐用生，2006a；Apple, 1993）。教科書是依據課程綱要，經由人規劃、設計出來的，過程中須考量特定團體的權力、出版社的經濟限制與市場利潤，它在教師的眼中是正式課程、是與學生互動的重要文本；在出版社的眼中是將轉化為利潤的商品；在實際上它是政治、文化、權力、預算與利潤妥協下的成品。

配合九年一貫課程，教育部依據《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科圖書由教育部審定，中小學教科書全面開放由民間出版社編輯，希冀透過市場自由競爭，使課程多元化、提升教科書品質。但教科書開放民編後，衍生教科書漲價及品質問題（彭致翎、詹美華，2011），且權力和利益的運作愈來愈明顯，加上民間出版社重視的是教科書版本的市場占有率，而不一定是內容品質，且為了投教科書選用者之所好，各版本互相模仿，企圖囊括所有版本的教材內容，多元成了假象，各版本特色淡化（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2010）。教科書開放這20幾年間，教科書版本的競爭，由教科書的內容是什麼，逐漸轉向教科書的贈送配套有哪些、出版社業務人員的服務品質是否優良、能否提供教師研習、擔任講師或教科書作者的機會等。

歐用生（2006b）指出，臺灣的教科書制度一直走在權力與利益爭奪的陰影下，呈現了資源的爭奪、政治的角力與權益的運作，但卻完全缺少了專業的對話和哲理的辯論。藍順德（2003）發現教科書開放民間出版社編輯之後，部分編者認為，民間教科書業者較重視能否通過審查、市場占有率，而

不重視教科書品質，業者投入於教科書研發編輯之費用，與花費於行銷、公開的成本，兩者相對不對稱。再則，教科書的相關研究大部分針對意識形態、詞彙、議題進行內容分析，或透過問卷瞭解教師對教材的滿意度，以及教師如何運用教科書（李翠玲，2011；徐偉民，2017；張美雲，2017；莊善媛、李隆盛，2011；許民陽、陳秀雯，2013；郭丁熒，2012；黃志成、游家政，1998；葉興華，2009），對於教科書編輯者的專業、培訓與在職進修，以及教科書發展課程的過程並不重視。較少由局內人——出版社編輯團隊和執行編輯者的角度進行檢視，論述出版社的編輯者應具備哪些能力？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若教科書編輯者僅依據市場及權力者的意見修改教科書，扮演「順應型知識份子」的角色，那麼教科書將只呈現某些團體的觀點，成為完全的經濟商品；反之，欲使教科書在文化、權力、經濟的角力下取得平衡，成為趨近課綱的產物，教科書編輯者應具有批判性的思考與行動力，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因此，本研究以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進行論述。

本研究先說明Giroux「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意涵，藉以論述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再透過局內人批判的觀點說明教科書編製過程與權力運作，其如何暗中破壞教育與教科書一綱多本，亦即研究者以親自參與有關教科書編輯相關事務所悉進行分析；最後提出在臺灣的教科書出版環境下，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實踐方向。

貳、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

教科書的推手是出版社的編輯者，其參與權力、知識的運作，以及哪些知識被納入或排除，但從事教育研究時，大部分關注的焦點在教師上，如Dewey（1934）提出「教師是藝術家」，教學是複雜的工作，須有反省和想像力，具實驗精神，所以是最好的藝術家才能勝任；Greene（1973）提出「教師即陌生人」，提醒教師應察覺例行活動中的潛在影響力；Giroux

(1988) 提出「教師即轉化型知識份子」，鼓勵教師發展批判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並培養學生成為具備知識的公民。那麼教科書編輯者應具備哪些能力？應扮演什麼樣的知識份子？才能使教科書在「文化物」與「經濟商品」之間有更佳的平衡點。以下藉 Giroux 對知識份子的分類，再進一步說明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

一、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意涵

在 Giroux (1993) 的論述中，將知識份子分為以下四類：

(一) 霸權型知識份子 (hegemonic intellectuals)

妥協於學術和政治團體，或打著客觀主義的旗幟。他們透過為統治階級提供道德和知識上的領導，通常扮演與統治階級為合夥人的角色。

(二) 順應型知識份子 (accommodating intellectuals)

通常選擇偏向統治群體，自由的遊走在階級衝突和黨派之間，屬於「西瓜倚大片 (pîng)」的角色。

(三) 批判型知識份子 (critical intellectuals)

能批判社會中的制度、文化與思想，但甚少與他人團結進行集體奮鬥，意即他們較少將批判轉化為實踐行動。

(四) 轉化型知識份子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能從知識建構的觀點，瞭解主體如何受到歷史脈絡中的社會形式所控制，並覺知這些社會形式隱含的特殊利益關係，且能與各類團體共同參與解放的行動。

Giroux 「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概念主要是受到 Gramsci (1976) 提出「有機的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s) 的影響，並主張教師即轉化型知識份子，而 Giroux 所謂的「轉化」就是要做到「有機化」(organicalization)，意即要先瞭解自身所處的情境脈絡，建立知識的判準、轉化的目標或方法，而非僅是批判。以下藉 Giroux 主張教師即轉化型知識份子之論述，使「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意義更明確。

二、教師即轉化型知識份子

由於教師每天工作繁多，且受到中央意識形態限制，需長時間獨立工作，較少有與其他教師討論的合作機會（Lortie, 1975），形成了「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的現象，教師被簡化為學校官僚體系中的專業技術工人，其功用只在於管理與實施課程，而非發展或批判課程，以符合社會脈絡的教育考量（Giroux, 1988）。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師工作貶值化、去技能化（de-skilling），因此Giroux力倡教師不是技匠，而是轉型的知識份子（歐用生，2019）。這樣的論述提醒我們提升人類思考與實務能力的價值，以及教師是反思實踐者的意涵。

Giroux（1988）指出教師即轉化型知識份子，並說明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核心在於使「教育更政治化，政治也更教育化」，促使教師發展出轉化社會結構的力量，讓學校成為轉化壓迫的場所。在「教育更政治化」的部分，教師應具備批判的反思與行動力，發現社會、學校中習以為常的不公平與不正義，透過批判的思考與行動改變它，對抗權力與壓迫，發揮人性關懷的實踐力量；在「政治更教育化」的部分，教師應將學生視為批判的行動主體，可以質疑所學的知識，利用批判與證實的對話，為所有人爭取一個更民主的社會。再則，轉化型知識份子必須發展出「批判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他們須質疑、反對學校內外於經濟、政治與社會不公平的現象，並致力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讓學生有機會成為有知識和能批判、實踐的公民。換言之，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角色，除了展現其教師教學專業，更重要的是發揮教師的社會責任、批判反思能力與關懷，以具體行動改變社會上的壓迫及不正義。

許誌庭（2002）論述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限制與實踐方向，指出這樣的角色實踐有三個特色，包含：（一）承擔社會責任，時刻提醒自己對學生的潛在影響力；（二）對社會中不公平不正義的現象了然於心，但非直接參與黨派活動來改變社會結構，而是培養學生的心靈，孕育未來的改

革力量；(三)在日常枝節之間，培養學生成為未來公民，間接行使對未來社會的強大影響力。葉子勝（2003）以Giroux批判教學論之教育與轉化型知識份子之理念，可為臺灣教師建構可能的行動方向，包含：(一)要能質疑學校存在的目的為何，不能將社會現有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二)要能站在社會正義與追求解放的立場，批判不公不義的社會施為與現象，並結合可能性的語言作為付諸實踐之策略；(三)要能擺脫去技能化的限制，有能力設計與發展課程，使學生的歷史、文化、經驗、夢想變得富有意義，從而批判與轉化之；(四)要能拓展學校成為民主的公共領域，培養師生成為有勇氣與責任的公民；(五)要能邁向結盟合作的社群生活。楊麗芳（2005）探討原住民教師如何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研究採用質性研究，研究對象為六位在國小服務的原住民校長、主任與教師，研究指出：原住民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條件為「意識形態條件」與「物質條件」，意識形態條件包括原住民教師的意識覺醒、產生集體行動與對抗學校行政規訓的策略；物質條件則是尋求經費支持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由上述可知，轉化型知識份子具備以下特質：

(一)具有「批判性的語言」：能夠覺知經濟、政治及社會中不公平與不正義的現象。

(二)具有「可能性的語言」：能夠利用批判與證實的對話，提出具體可行之策略，再透過行動改變社會不公平與不正義的現象。

(三)實踐人性關懷的力量：能夠關懷被壓迫者，並勇於對抗權力。

(四)創造民主的社會：能夠透過多元的方式，引導他人質疑習以為常的知識與權力關係，成為批判的行動主體。

(五)孕育未來的改革力量：能夠在日常工作與生活中，間接發揮對未來社會的影響力，使學生或他人有機會成為有責任感的公民。

三、教科書編輯者與「轉化型知識份子」之間的連結

教科書是中小學教學的重要教材，是教師課堂上教學的主要來源，是學

生學習中所使用的主要媒介，更是考試命題的依據（黃政傑，1998），而且教科書還有發展個人知識與技能、傳遞思想與文化、建立社會價值及國家意識等重要功能，其品質的良窳影響著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更牽動著整體教育。因此，規劃與編輯品質良好的教科書，實為出版社的教育道德責任與社會責任。

出版社編輯或修訂教科書時，通常先進行市場調查，瞭解大部分教師的意見，但納入修改的不一定是符合課綱或符合學生發展的，而可能是握有決定多數版本的教師所提出的意見，出版社為了版本占有率、節省成本與獲取利潤，常將這些意見視為「聖旨」，教科書編輯者無決定權，僅被要求逐條修正。在此情況下，教科書編輯者的工作被貶值且去技能化，被簡化為「蒙住雙眼、遮住耳朵」的技術工人，其功用僅在書寫他人期望的文字、管理編輯進度，而非發展教科書和批判市場調查的意見，教科書編輯者僅是出版社如機器般的工具。

一本教科書若沒有嚴謹的編輯團隊，按編輯計畫進行編輯，很容易讓人有整本教科書看完了，卻看不出教材的「牛肉」在哪裡之慨歎（歐用生，2006b）。因此，教科書編輯者須具有架構整套教材之規劃能力，不因版本占有率隨波逐流，將內容東拼西湊，納入某部分教師認為好教、易發揮的主題或課文，但整體評估卻是排除某些重要議題，或某些特定主題疊床架屋。有研究指出，教科書內容最後所呈現出來的內容與形式，與其編輯群原先規劃的設計理念有落差，而具有向市場傾斜的「內容簡單」、「容易教授」、「容易批改」、「內容趨同」等特性（邱千芳，2006；鄧鈞文，2001），例如：國小閩南語課本的練習題，大多納入圈圈看、連連看、勾選題或填代號的題型，盡量排除書寫閩南語漢字的練習題，以符合「容易學」、「容易教」、「容易批改」的市場調查意見。為避免教科書走向各家趨同化，甚至因為模仿而破壞了事先規劃好的整體架構，以及促使教科書成為引導學生主動思考、發現需改變的社會現象，並成為教師由傳統講述教學轉向為素養導向教學方式的媒介之一，編輯者應具備批判的反思與行動力，發展出「批判

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反思、批判納入的知識、修改意見背後代表的意涵，以及其將如何影響教育，並質疑、反對將教科書被過度簡化，使學生陷入「假的快樂學習」，缺乏思辨機會，應該設法發展解套的方式，在知識、市場、權力中盡量尋得平衡點。因此，教科書內容不應偏向某一政黨或特殊權力團體，成為特定族群或利益團體的代理者，納入他們的知識與文化價值，教科書須價值中立，致力於創造民主的社會。

基於上述觀點，教科書編輯者的角色不應是「霸權型知識份子」，妥協於學術和政治團體，為統治群體編輯符合其內在思維體系的知識，造成文化再製的社會現象；也不應是「順應型知識份子」，選擇站在統治群體的意識形態和現實物質之中，如同牆頭草的投機者；也不應是「批判型知識份子」，僅批判社會制度、文化與思想，僅是抱怨著編輯違心之論的教科書，卻不將批判轉化為具體的實踐行動。教科書編輯者須能自我批判、洞察各種權力下的意識形態及利益糾葛，並將上述覺知實踐於教科書規劃與編輯歷程中，引導學生將所學連結於生活中，成為具有責任與正義感的公民，亦即具備「批判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透過教科書規劃與編輯，實踐人性關懷，成為改變教育與創造民主社會的幕後執行者之一。

綜合上述，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有其必要性，教科書編輯者須具備「批判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才能在社會結構、政治、文化中，覺察知識與權力間的關係，並願意肩負起責任，在複雜的脈絡下，找到合宜的課程發展方案。在這種論述中，編輯者如何批判教科書的編製過程？以下從局內人的觀點說明教科書的編製過程，以及其中權力運作的問題。

參、局內人的觀點——教科書的編製過程與權力運作

後再概念化學者Malewski（2010）指出，若課程研究分為「局外」（outside）與「局內」（inside），這樣二元對立的分法是被過分簡單化，

建議轉向「局外人——走進來」與「局內人——走出去」的觀點，以協助我們探討「增殖繁衍」(proliferating)。增殖繁衍是指引起快速的成長或增加，它在一個研究領域中，並不能夠存留於特定的形式、結構或機制當中(楊俊鴻、蔡清田，2010)。此概念提醒我們，權力不是一元化的運作，而是交互作用的關係，所以藉此論述，期望局外人能走進來，改變原有的權力關係，開放新的視野、聲音、知識或研究成果；期望局內人能走出去，嘗試與突破思維的框架，檢視自己工作日常的細微枝節，如同Greene(1973)以「教師即陌生人」的隱喻提醒教師應以探究、新奇的視野面對日常生活，如「返鄉遊子」去察覺過去不曾留意的細節、去質疑不曾疑惑的習慣，用新的視野重新檢視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現象，並再詮釋所見所聞，再建構新意義。接著，以下先說明教科書的編輯與規劃，並以Apple(1990, 1993)的官方知識與相關論題，提出說明教科書的知識與權力運作，再嘗試由局內人的觀點反思教科書編輯過程如何暗中破壞教育與教科書一網多本。

一、教科書的編輯與規劃

教科書編製是一個長期、昂貴、複雜的過程(Keith, 1991)。隨著每一家出版社的規模與文化差異，工作流程與責任分配也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教科書的編輯與規劃須符合課程綱要，考量社會發展、知識系統、學生的學習發展等。以下說明一般教科書編輯與規劃的步驟，以及其中可能潛藏的權力運作問題。

(一)準備階段

教材規劃前，大多會先由教科書企劃人員提案，根據課程綱要擬定教材計畫大綱，並進行市場調查與版本分析，派遣業務專員諮詢教師各種教學需求、對教科書的意見等，最後由出版社、教師編輯群和執行編輯者建立基本共識，形成教科書初步的理念、風格、體例及全冊總頁數等。在此階段中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哪些教師被納入或排除諮詢教科書的意見？教科書被設定的總頁數代表什麼意思？是妥善規劃課程的節數，還是以頁數議價的利

潤？

(二)編輯與印製階段

教師編輯群和執行編輯者撰寫教科書初稿，完成後執行編輯者再與美編、攝影師溝通，進行版面規劃、插圖設計、照相等工作，完成文稿校改後，聘請學者教授進行審稿，最後進行小規模的教科書試用，彙整試用結果並修改後，再送交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審查通過後，由編輯部門協助製版，完成後由發行部門印刷、處理特殊頁、膠裝成書。在此階段中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為什麼邀請某位教授、教師加入編輯群？背後隱藏的勢力範圍是什麼？將帶來什麼後續利益？在編輯閩南語教科書時，為什麼設定的臺羅拼音課程分量是如此？是參考學生的發展、教師的意見，還是想拉攏哪一類教師族群？

(三)行銷與服務階段

行銷前，出版社業務部門進行教育訓練，並規劃行銷波段與宣傳品項，為了提高銷售量，出版社可能會舉辦教師研習、教材座談會、教科書展覽等，最後部分縣市會舉辦教材說明會，請各出版社派一名代表，統一向教師介紹教科書的特色。在此階段中值得思考的問題包括：哪些教師被納入此階段的服務對象？這些過程是為了選擇適合師生的教科書，還是能提供資源、服務或利益的出版社？

開放教科書出版的目的是期盼教科書更多元、打破部編的一元化，但事實上只是轉移戰場，且愈戰愈激烈，在此並非批評一綱多本的政策，而是期盼如何使一綱多本更好，使師生有更多適合且內容真正多元化的教科書版本可選擇。

二、教科書的知識與權力運作

Apple與Christian-Smith（1991）在《教科書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引導讀者思考教科書與權力、利益、政治之間的關係，使課程知識的發展由Spencer提出「什麼知識最有價值」轉向關注「誰的知識最

有價值」，並提出教科書並非簡單的「傳遞系統」或「事實」，而是與當下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角逐與妥協的結果，是由具有權力或利益者共同規劃與製造而成的商品。

Apple (1993) 在《官方知識》(Official Knowledge) 指出，改革者以為改革學校教育便能改革一切，但事實不然，使得教育經常成為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問題的代罪羔羊，且握有權力或利益者認為某些團體的知識為正式的知識，該知識便被認定是最重要的，亦即被視為官方知識 (Apple, 1990, 1993)。教科書與學校教育傳遞的官方知識，使學校課程彷彿文化霸權的代理者，部分內容選擇特定統治階層的知識為正式課程，合法化學校課程背後所隱藏的階級、性別與種族等意識形態 (Apple, 1990)。

在臺灣，教科書經過國家教育研究院審定通過後，具有合法化的特質，成為學校傳遞知識的重要媒介，但在知識選擇、內容撰寫、圖片或照片搭配、編印與發行等過程，皆出現一些令人質疑與批判的聲音。基於教科書編製的過程包含複雜的知識與權力運作關係，教科書研究的方向，不僅要關切教科書編寫的技術性問題，還要探究教科書選擇官方知識背後的意識形態。以下接續闡述教科書知識選擇與決策背後的權力運作關係，以及其如何破壞教育與一綱多本之教育政策。

三、教科書如何暗中破壞教育與一綱多本

經過國家教育研究院審查通過的教科書，因取得合法化，使潛藏於其中的知識與權力運作能理所當然地被送至教育現場，再加上出版社的經營運作，產生暗中破壞教育與教科書一綱多本的力量。而教科書與其附加的有形、無形產物如何暗中破壞教育與一綱多本之教育政策？研究者以曾任職教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之經驗，以及與其他出版從業人員互動之經驗，茲說明如下。

(一)貼心的服務使教師「去技能化」

出版社為了推銷教科書，「極度貼心」為教師服務，除了贈送教具，還

提供補充教材、測驗卷、教學電子書，也為學校編寫課程計畫，這些「貼心」的附加商品與服務，暗中將教師「去技能化」。由於現代科技進步，教材教法中結合科技媒材不勝枚舉。但是，科技媒材只是一種工具與技術，原本是用來提供運用不同尋找或傳遞資訊的方式，不應取代教師教學引導的策略或師生互動。研究者於任職教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時，經常聽到教師反應：「快要開學了，如果教學電子書光碟不能在開學前送到學校，我就沒辦法上課了」（編輯工作紀事0617）、「沒有教學電子書怎麼上課？」（編輯工作紀事0815）。換言之，部分教師上課一定要用到教學電子書。原本教師是運用工具者，但卻受限於教學電子書，這種「異化」的現象不僅使教師「去技能化」，也使學生習慣教學電子書的聲光效果刺激，而降低了教與學的品质。

（二）市場競爭下的「偽一綱多本」

臺灣教科書有三家主要出版社，加上其他規模中小型的出版社，依常理而言，教科書類型應是百花齊放，但事實上各家的內容、教案活動類似，沒有教科書出版社勇於大幅度修改，使教師難以改變原有的教學策略與教學模式。出版社業務人員經過市場調查，瞭解教師選書的需求與原則，再經過幾次的教科書修訂後，各家出版社的教科書內容與設計漸趨相近。例如，研究者於任職教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時，曾聽過教師反應：

這次我們在選課本的時候，先把封面撕掉了，避免有主觀的選書意見，但是發現有兩個版本的主題和體例接近，我還猜錯選到的版本是哪一家出版社的課本。（編輯工作紀事0613）

雖然自由經濟下，模仿市占率較高的產品是正常現象，但在這樣操作的過程下，出版社已不重視什麼是「一綱多本」、教科書開放的精神何在，不用再思量如何規劃課程，也不需聘任具課程觀、教育專業的編輯者，只要聽從市場調查的聲音即可，教科書修改東拼西湊，為了修改而修改，缺乏特色與系

統性。

(三)教科書「新瓶裝舊酒」

佐藤學教授提到過去的兩種學習，learning 1是知識的學習，這是可見的，指知識的背誦理解；learning 2是學習方法的學習，這是不可見的，是一種思考方式的學習。在現在變動的時代，這兩種學習已經有極限，所以佐藤學教授建議進行learning 3，指發展自己的觀點，形成自己的心智工具，來管制自己的認知，讓自己的認知看得到，即所謂的「後設認知」（陳麗華等，2018：132）。如果教科書內容沒有改變，教材教法依舊，新課綱將無法改變任何事情（Jobrack, 2012）。研究者任職教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時，在學校進行市場調查，訪問教師對教科書的使用意見，曾有教師反應：

○○課本就像拼裝車，有的只改課文沒有改練習題，有的就換一下題目，有的內容跟以前一樣，只是換了新的圖，所以用起來都差不多。
（編輯工作紀事1127）

研究者認為教育改革並非僅是將「基本能力指標」改為「核心素養」，而是調整教育課程和實踐，若教師對新課綱改變的教育目的、理論和內容沒有充分瞭解，加上出版社只是為了因應新課綱而局部抽換部分內容、新增一至二個新體例，實質上沒有改變，那麼只是一些挖東牆補西牆的課程。例如，語文領域的教材改版，不應只是換課文、增減生字和語詞量，或調整部分練習題的難易度，而是教材要做什麼不同的設計，使課程的重心轉移至師生互動、學生同儕互動，改變教師的教學模式。

肆、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之實踐方向

在論述轉化型知識份子的意涵，並由局內人的觀點批判教科書編製過程

與教科書偽一綱多本的現象之後，本研究有必要發展出「可能性的語言」，為教科書編輯者提供可行的實踐方向。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時，並不是對著社會大眾發聲，也無法向每一位教師與學生發揮直接的影響力，而是將自己的聲音藉由教科書的圖、文來傳達，透過符號來實踐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力量。由上述相關文獻與曾任編輯工作之相關經驗，說明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可從下列四個方向實踐：

一、看見「看不見」的連結點

為什麼教科書編輯者忽略了教科書的內容是什麼？什麼是好的教科書？一方面來自編輯者「聽話」與「看不見」，無論是外聘的教師編輯群還是出版社的執行編輯者，都是領薪工作，為出版社賺取利潤的角色，即使有覺知性的想法，最終會屈服於市場考量；另一方面是編輯者缺乏批判思考能力，「看不見」現象背後的真相及深層意義，也看不見自己編寫的內容隱含著什麼意識形態與刻板印象。以下以研究者曾任教科書出版社編輯工作的經驗為例，說明教科書編輯者某些時刻無法發現自己存有的意識形態。

審稿後，編輯A告訴編輯B：「全冊的○○部分必須整體檢視，因為太多性別刻板印象。」編輯B說：「我哪有性別刻板印象？難道要我寫『爸爸在廚房煮飯』嗎……」後來，教科書審查意見以「違反性別平等和太多性別刻板印象的內容，例如：外出、工作的都是男性，做家事的都是女性。」列為必要修改意見。編輯B看完審查意見說：「這是備課用書，是給老師看的，又不是給學生看的，老師如果覺得違反性別平等，就省略不要用這部分就好了啊……。」（編輯工作紀事1029）

這樣的例子提醒教科書編輯者：我們用誰的知識去認同，自己能不能發現自己戴了什麼樣的「眼鏡」看世界？我們不能過度依賴同一副「眼鏡」，

從不質疑眼前看到的「黑」是社會本身的問題，還是自己戴的「眼鏡」出了問題。因此，我們有時須摘下「眼鏡」，檢視它的合宜性。

再則，教科書編輯者不應只是完成文字書寫的工作，應覺知納入與排除的內容是一個「教學主題」還是「意識形態」。如同Philip W. Jackson書寫《教室生涯》（*Life in Classrooms*）的方式，他細緻地描述教室中師生的日常生活，並將所見所聞的影像和對話象徵化，透過這樣的觀察，看到的不再是表象的互動，而是形成此現象的背後脈絡或意識形態。因此，教科書編輯者應覺知自己納入與排除的主題或內容，反思形成此教科書主題架構與內容的背後脈絡或意識形態，對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真正的影響力有多深，必須時刻提醒自己看「看不見」的潛在影響力，並不斷地學習與批判思考。

二、承擔社會責任

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工作不是親自挺身去對抗政治文化的巨靈，或直接參與黨派活動來進行轉化社會結構，而是去孕育未來的改革力量（許誌庭，2002）。教科書編輯者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應透過敏覺的心靈，發現社會的不公不義，透過教科書的規劃，使教師能引導學生思辨，不應認為教科書印刷後，責任已結束，教學與解碼文本是教師的責任。雖然編輯者不需參與教室生活，但不能因為自己不需面對教學結果而迴避需承擔的社會責任。

教科書發展是合作的歷程，但是在教科書審查過程中，因編輯者、審查者和使用者各具立場，權力不同，各有心結，甚至形成嚴重的對立，這絕對非教科書制度之福（歐用生，2006b）。審查委員積極為教科書是否符合課綱、教育理想把關，使用者考量教學和學習的效果，編輯者應串連審查的意見、多數使用者的聲音，為編輯好的、實用的教科書而努力。編輯者、審查者和使用者應共同體認發展教科書的社會責任，三者之間應有更多的溝通機會，共同研討如何將課綱具體化於教科書中，承擔發展愈來愈理想的教科書之社會責任。

三、發展真正的一綱「多本」

教科書趨同化，此種「偽一綱多本」的現象，通常是市場取向的因素一向市占率高的版本看齊，甚至有時為了模仿市占率高的版本，不只破壞了自己原有的課程規劃，而且還僅模仿了表面的皮毛。這樣的教科書現象，如同方孝孺《遜志齋集·越車》一文中，越國人效仿他國造車的事例：越國原本沒有車，有一越人在郊外發現一輛車輪、車轆已經毀壞的車，因為不知其真實樣貌，以為那就是堅固的車子，大家就一味的做成相似的模樣。直到外敵侵略時，越國就用這樣簡陋的車去禦敵，結果不僅打敗仗，而且始終不知道真正的車是怎麼造的。因此，只看市場意見，忽略教科書整體的規劃與理論，短暫的獲得版本，但是卻失去了本身教科書的特色，也破壞了一綱多本的教育理念。

再則，教科書中的提問通常和事實有關，如主角是誰、發生什麼事、為什麼發生，但是要求學生論說與做出評斷則較少，如你的意見是什麼、你為什麼這樣想（陳麗華等，2018：123）。與事實有關的問題較簡單、有明確且單一的答案，若是開放性、批判思考性的問題，教師引導討論與批改作業相對需要較多的時間，所以有時教科書會以「教師輕鬆備課，學生快樂學習」為行銷方向，促使練習題大多是非開放性的題目，如是非題、選擇題、勾選題或配合題等。但是教科書的發展除了要符合新課綱，在問題設計方面也要符合前文佐藤學教授提及的learning 2和learning 3，使教育改革逐漸趨向可能，而且當各版本的內容發展真的不同了，「選版本」才能發揮教學專業，不會再是計較插圖中電視機有沒有換成液晶電視、智慧型手機是不是最新的型號，或課文總共有幾個字、練習題的份量有多少等。基於上述內容，建議政府鼓勵各出版社發展具特色的教科書，如透過教科書鑑賞制度，使出版社有誘因和道德責任，能勇於走出習以為常的教科書樣貌。

四、鼓勵出版社編輯者在職進修與提升能力

一般出版社將教科書的內容交由外聘的教師編輯群書寫，再由內部執行編輯者彙整並進行相關編製流程，不同規模的出版社在流程上也有不同的調整，如有些出版社由內部執行編輯者寫稿後，再由外聘的教師協助審稿；有些出版社則由內部執行編輯者負責，再輔以領域學者或教師作為顧問諮詢意見。無論何種執行方式，出版社內部的執行編輯者都須全程參與，因此他們不僅應具備書寫、編輯能力，更應理解新課綱的內容及課程理論，不能僅是對教材做「表面式的修改」，例如，將備課用書中的基本能力改為核心素養、能力指標改為學習表現，但實質設計概念依舊。

教育改革不能僅依靠教育學者和教師的力量，學校外的教育相關人員也應納入，但在教育研究或在職進修中，大部分以學校教師為主，甚少有出版社編輯者、作者或行銷企劃人員等，研究者建議新課綱的宣導與研習也應將出版社從業人員納入，提升其相關能力，以避免錯誤詮釋新課綱，或過度簡化新課綱的意義；再則，由於師資培育過程對於上文佐藤學教授提出的 learning 2與learning 3較少觸及，若教科書可將這部分可視化，應能夠幫助教師理解learning 2，進而發展自己的learning 3（陳麗華等，2018：144）。這樣的理念甚好，但教師在師資培育過程較少觸及，相對的教科書編輯者亦缺少這樣的思維，因此應鼓勵編輯者再進修，將學者的研究與論述實踐於教科書，提升教科書的專業性。

伍、結語

教科書是教學中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教育改革中也被視為重要的產物，但有關教科書的研究大多集中於內容分析、教師使用滿意度、教科書選用標準等，對於教科書編輯者的專業、培訓與在職進修，以及教科書發展課程的過程並不重視。教科書編輯者不應成為製作教科書的技術工，應作為轉型的

知識份子，發展其「批判性的語言」與「可能性的語言」，慎思教科書的一字一句、圖文安排、議題規劃、課程發展等，促使教科書再概念化。

我們期望有愈來愈好的教科書，但卻沒有完整的教科書編輯者的培育制度，也沒有相關的在職進修方案，要如何使它更好、更符合新課綱與理論？即使規模較大的出版社，能聘請學者教授擔任領域主編，也有教師編輯群，但若出版社執行編輯者缺乏課程理論的概念與該領域的專業知識，也無法與教授和教師們進行良好的溝通，使審查、編輯、市場意見做有效的統整，因此須重視教科書編輯者的專業能力，使其成為轉化型知識份子。

誌謝：感謝匿名審查委員與編輯老師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讓作者能即時修正本文的若干缺失。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李翠玲 (2011)。國小語文領域教科書中身心障礙人物之內容分析研究。教科書研究，4 (1)，31-54。doi:10.6481/JTR.201106.0031
- [Lee, T.-L. (2011). Content analysi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ese-Language elementary school textbooks.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4(1), 31-54. doi:10.6481/JTR.201106.0031]
- 邱千芳 (2006)。九年一貫國小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發展研究：以青春版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Chiu, C.-F. (2006). *The textbook development of grade 1-9 elementary social study: A case study of youth oriented*.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pei, Taiwan.]
- 徐偉民 (2017)。小學數學教科書使用之探究。教科書研究，10 (2)，99-132。doi:10.6481/JTR.201708_10(2).04
- [Hsu, W.-M. (2017). Investigation of elementary mathematics textbooks use in classrooms in Taiwan.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10(2), 99-132. doi:10.6481/JTR.201708_10(2).04]
- 張芬芬、陳麗華、楊國揚 (2010)。臺灣九年一貫課程轉化之議題與因素。教科書研究，3 (1)，1-40。doi:10.6481/JTR.201006.0001
- [Chang, F.-F., Chen, L.-H., & Yang, K.-Y. (2010). Transformational issues of grades 1-9 curriculum reform in Taiwan.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3(1), 1-40. doi:10.6481/JTR.201006.0001]
- 張美雲 (2017)。國民小學高年級教科書海洋教育內容之分析——以康軒版為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 [Chang, M.-Y. (2017). *The content analysis study of marine education in fifth*

and sixth grade textbooks: Kang Hsuan publish as exampl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aichung, Taiwan.]

莊善媛、李隆盛（2011）。國中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對部編本教科書之滿意度調查研究。《教科書研究》，4（1），55-85。doi:10.6481/JTR.201106.005

[Chuang, S.-Y., & Lee, L.-S. (2011). A surve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achers' satisfaction with textbook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4(1), 55-85. doi:10.6481/JTR.201106.005]

許民陽、陳秀雯（2013）。大臺北地區國民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科書選用之研究。《教科書研究》，6（3），1-34。doi:10.6481/JTR.201312_6(3).01

[Hsu, M.-Y., & Chen, H.-W. (2013). A study of sele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xtbooks used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Greater Taipei Area.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6(3), 1-34. doi:10.6481/JTR.201312_6(3).01]

許誌庭（2002）。教師做為轉化型知識份子的可能性、限制與實踐方向。《教育研究集刊》，48（4），27-52。

[Hsu, C.-T. (2002). Teachers as the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Possibilities, limits and practice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8(4), 27-52.]

郭丁癸（2012）。不同版本國小國語教科書中學生角色之比較——以民國80與90年代為例。《教科書研究》，5（2），73-101。doi:10.6481/JTR.201208.0073

[Guo, D.-Y. (2012). Comparison of student roles described in elementary-school Mandarin textbooks released by different publishers between 1990 and 2010.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5(2), 73-101. doi:10.6481/JTR.201208.0073]

陳麗華、李涵鈺、洪詠善、歐用生、佐藤學、黃郁倫（2018）。中小學教材

- 教法的現況觀察與改革契機——素養導向觀點。教科書研究，11（2），109-145。doi:10.6481/JTR.201808_11(2).05
- [Chen, L.-Y., Lee, H.-Y., Hong, Y.-S., Ou, Y.-S., Sato, M., & Huang, Y.-L. (2018). Observ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regard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competence-based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11(2), 109-145. doi:10.6481/JTR.201808_11(2).05]
- 彭致翎、詹美華（2011）。部編和民編教科書併行審定制政策之爭議分析。教科書研究，4（1），1-30。doi:10.6481/JTR.201106.0001
- [Peng, C.-L., & Zhan, M.-H. (2011). An analysis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policy of concurrently reviewing and approving publicly and privately compiled textbooks. *Journal of Textbook Research*, 4(1), 1-30. doi:10.6481/JTR.201106.0001]
- 黃志成、游家政（1998）。國民小學教科書選用的問題。課程與教學季刊，1（1），57-75。doi:10.6384/CIQ.199801.0057
- [Huang, C.-C., & You, C.-C. (1998). Problems of textbook sele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1(1), 57-75. doi:10.6384/CIQ.199801.0057]
- 黃政傑（1998）。建立優良的教科書審定制。課程與教學季刊，1（1），1-16。doi:10.6384/CIQ.199801.0001
- [Hwang, J.-J. (1998). Establish a good textbook review system.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1(1), 1-16. doi:10.6384/CIQ.199801.0001]
- 楊俊鴻、蔡清田（2010）。課程研究的下一個世代。課程研究，5（2），163-174。
- [Yang, C.-H., & Tsai, C.-T. (2010). Curriculum studies handbook: The next moment. *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 5(2), 163-174.]
- 楊麗芳（2005）。抗拒與轉化——原住民教師的課程實踐。國立交通大學教

- 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 [Yang, L.-F. (2005). *Resistance and transformation — The aboriginal teachers' curricular practi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 葉子勝（2003）。Giroux教師作為轉化型知識份子之研究：兼論其對台灣教師與師資培育課程之啟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 [Yeh, T.-S. (2003). *A study of Henry A. Giroux's teachers as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ion curricula in Taiwa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County, Taiwan.]
- 葉興華（2009）。臺北市國小教師教科書選用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40（2），33-72。doi:10.6336/JUTe/2009.40(2)2
- [Yeh, S.-H. (2009). Research on textbook selection and use by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ity.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Taipei · Education*, 40(2), 33-72. doi:10.6336/JUTe/2009.40(2)2]
- 歐用生（2006a）。台灣教科書政策的批判論述分析。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4（2），1-26。
- [Ou, Y.-S. (2006a).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extbook policies in Taiwa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14(2), 1-26.]
- 歐用生（2006b）。課程理論與實踐。臺北市：學富。
- [Ou, Y.-S. (2006b).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Taipei, Taiwan: Pro-Ed.]
- 歐用生（2019）。課程語錄（貳）。臺北市：五南。
- [Ou, Y.-S. (2019). *Course quotations (II)*. Taipei, Taiwan: Wu-Nan.]
- 鄧鈞文（2001）。臺灣地區國民小學教科書市場機制運作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所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Teng, C.-W. (2001). *A study on the market mechanism of elementary textbook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藍順德 (2003)。教科書審定制度運作之問題檢討與改進建議。課程與教學季刊, 6 (1), 13-26。doi:10.6384/CIQ.200301.0013

[Lan, H.-T. (2003). An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on the operation of textbook examination system problems. *Curriculum & Instruction Quarterly*, 6(1), 13-26. doi:10.6384/CIQ.200301.0013]

(二)英文部分

Apple, M. W. (1990). *Ideology and curriculum*.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Apple, M. W. (1993). *Offical knowledge — Democratic education in a conservative age*. New York: Routledge .

Apple, M. W., & Christian-Smith, L. K. (1991). *The politics of the textbook*. New York: Routledge.

Dewey, J. (1934). *Art as experience*. New York: Minton.

Giroux, H. (1988). *Teachers as intellectuals —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of learning*. New York: Bergin & Garvey.

Giroux, H. (1993). Cultural politics, reading formations, and the role of teachers as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S. Aronowitz & H. Giroux (Eds.), *Postmodern education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al criticism* (pp. 87-113).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sota Press.

Gramsci, A. (1976). The intellectuals. In R. Dale, G. Esland, & M. MacDonald (Eds.), *Schooling and capitalism: A sociological reader* (pp. 218-23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reene, M. (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age*. Belmont, CA: Wadsworth.

Jobrack, B. (2012). *Tyranny of the textbook: An insider exposes how educational materials undermine reforms*.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 Keith, S. (1991). The determinants of textbook content. In P. G. Altbach (Ed.), *Textbooks in American society: Politics, policy, and pedagogy* (pp. 43-60).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Lortie, D. C. (1975). *Schoolteacher: A sociological stud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lewski, E. (2010). Introduction: Proliferating curriculum. In E. Malewski (Ed.), *Curriculum studies handbook: The next moment* (pp. 1-39). New York: Routledge.